

2017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方 铭 张 鹤

(北京语言大学 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 北京 100083)

摘 要:2017年屈原及楚辞研究创获颇丰,成果显著。统计本年度出版和发表的论著、论文可知,研究范围大致包括: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四个部分。研究成果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方法新与角度新;二是重视出土文献。

关键词:屈原;楚辞;楚辞学史;宋玉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20)01-0020-13

2017年国内外出版屈原及楚辞研究论著四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两百余篇,毕业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近60篇。学者们从文献学、文艺学、语言学、心理学、神话学、考古与地理学、民族与民俗学等角度展开研究,成果包括屈原的生平经历及爱国思想、楚辞与中国文学及文化、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等方面。本文就2017年度屈原及楚辞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屈原身世经历研究

读《楚辞》,首先需要了解屈原和理解屈原,屈原研究是楚辞学研究的重点。2017年学者们对屈原的研究涉及:屈原身世、屈原思想精神、屈原人格形象、屈原与其他人物比较研究诸多方面。屈原世系考订是屈原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周建忠^[1]通过对屈氏地域的位置、郢都的定都时间和范围、“堵敖”“成王”以及“邛仲嫫”兄妹关系等问题的考证认为,屈氏“与楚同姓”,源于楚武王,在春秋、战国时期均为大姓,历久不衰。屈氏家族在战国时代,尤其是楚怀王时期职务较高,势力较大,责任较重,人数较多,其中屈

句、屈原、屈易都是身负国家重要职务的屈氏成员。《屈原列传》《新序·屈原章》《离骚赞序》《离骚经章句前序》是研究屈原生平的最重要资料,但是它们之间的文献关系还缺乏准确的认识。谢天鹏^[2]通过对四种文献逐句逐字的对比分析,发现它们在史料选择、史料排列、句式结构和词汇组合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这四种文献实际上是具有承袭关系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序·屈原章》是刘向承袭《屈原列传》而又加以补正的成果,因此它异于《屈原列传》的史料就更有价值。屈原使齐的次数、遭馋的原因,《新序·屈原章》有不同于《屈原列传》之处,通过考察可以看出刘向所录实际上更加合乎事理,那种主观地以《屈原列传》而否定《新序·屈原章》史料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关于屈原的生年、卒年和享年,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郑志强^[3]认为,屈原生年应以公元前353年为宜;屈原卒年应以公元前278年为宜;而屈原享年应以74岁更加接近历史事实。王峰^[4]认为,屈原应为楚怀王的同龄人,故其生年为公元

收稿日期:2019-12-15

作者简介:方铭,男,甘肃庆阳人,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张鹤,女,江苏连云港人,北京语言大学讲师。

前 353 年较为可靠,出生地应是湖北秭归。翦永胜^[5]通过考查沅水地域文化特点及分析《楚辞》作品发现,屈原不但深谙沅水文化,且对沅水两岸有浓厚的故乡情结,其出生地应是“楚国孟陬(楚襄王时为‘黔中’)采菱城”。

屈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名人,1953 年更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屈原成为端午节的代表,本是地方文化的说法,被全国接受是近代才有的事情。关于端午名称的来历,众说纷纭,已不可考。方铭^[6]认为,古代端午有众多文化风俗活动,因地域和年代的不同而展现出丰富的面貌。端午节与伍子胥和屈原的联系,赋予了端午节独特的文化意义。汉魏时期,学者们出于各人不同的立场和时代观念,对屈原的评论存在着巨大差异。朱玉纯^[7]将古代著名学者如贾谊、司马迁、扬雄、王逸、刘勰等人的观点分为三类,并透过汉魏时期对屈原评论由极度的推崇转向贬责、再到中和的赞赏这一曲折转变,论述了汉魏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以及在时代大观念下文学理论受到的影响。龚红林等^[8]认为,在屈原文化价值体系的演变中,屈原由普通的“士”成为被敬仰的“人格的神”,又由“人格的神”演变为“爱国的精神标识”。人们力图在屈原的解读与描写中,重现历史事件中个体生命的自我体验与价值困境,并复归传统文化精神,重构一种普泛化的伦理道德形态。

屈原人格形象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较多关注。张世磊^[9]认为,屈原人格特质非儒非道,主要表现为勇于担当、九死不悔、好修及耿介婞直、勇于斗争等;战国崇圣尚贤的文化思潮,促成了屈原圣君贤臣两美相合的“美政”理想。秦兴友^[10]认为,屈原人格范式的本质是爱国主义精神,其基本要素包括有志于道、变革图强、上下求索、批判意识、进取精神、高洁忠贞,充满浪漫理想,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仁人志士。此外,唐旭东^[11]对南

阳屈原传说中的屈原形象进行了概述,郑晓丽^[12]从天下大一统趋势的角度对屈原作了评价。

屈原的“放逐”是屈原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自古意见纷呈,难有定论。周秉高^[13]认为,“屈原放逐著《离骚》”是在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 313 年)。通过对历史文献所载时间的推算,亦可知“屈原放逐著《离骚》”的季节应该是秋天。王强^[14]对屈原的“放逐”与“流放”加以考辨,认为先秦时期“放”是指针对部落首领、士大夫的政治驱逐措施,与封建时代的流放之刑有本质区别;为避免混乱,应从司马迁之说,统一表述为“放逐”。

二、楚辞作品研究

2017 年不少学者对楚辞作品展开了心理学、美学、文化学、宗教学、神话学的多角度研究。黄超等人^[15]以《离骚》的忠君爱国之情、屈原坚贞高洁的品格、绝世独立的形象三者为研究重点,综合分析了“屈骚”所蕴含的多元心理孤独体验。吴汶津^[16]对《离骚》和《九章》中屈原的“重华情结”内涵进行了仔细的美学辨析。陈明霞等^[17]认为,屈骚精神体现为修己精神、怀疑精神、美政精神、爱国精神与殉道精神,并呈现出情深的美学特色。涂早玲^[18]将《离骚》中“上天入地”的精神求索与西方“重回伊甸园”的原型主题进行了比较研究。李春霞^[19]、陈望衡^[20]、刘奕^[21]、罗海亮^[22]、孙玉茜^[23]等学者也将楚辞置于美学视域下分别从不同角度予以解读。《离骚》描写了三次神游:苍梧问舜之游,邻国求女之游,昆仑凭吊之游。宋小克^[24]通过辨析《离骚》神游与鲧、兜、三苗、共工等“四罪”流放之关系,认为屈原凭吊楚族先贤意在追溯楚族桀骜不驯、正道直行的精神。《离骚》中的宓妃,学界一直多有争议,三国如淳和宋洪兴祖认为是宓羲氏之女,清屈复和近人游国恩先生认为是宓羲氏之妃,近人姜亮夫先生认为是夏王朝昏君“夷羿”之妻,今人李炳海认为是宓羲氏之母,是一位感应生

子、传奇色彩极浓的女性。通过对宓妃身份这一问题的确切考证,可使长期纠缠不清的《离骚》中“求女”的比兴内涵问题得以解决。张文锦^[25]梳理评述了各家观点,对“宓妃”的真实身份进行了考辨。

通过对《大司命》的辩译,及对历代楚辞学者传统观点的梳理和评析,从药汀^[26]认为,屈原赋《九歌》是诗人假借古代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的歌舞形式和曲调节奏,别出心裁,独自创作的神话诗、歌舞剧,是极富审美价值的艺术创作,不是为宫廷写的祭祀歌。解说《九歌》,当以屈子《九歌》文本为依据,排除自古以来认为其为祭祀而写的“祭祀歌”的思维定式。潘庆^[27]从《九歌》创作的背景、神祇意象分析及其在楚辞中的地位三个方面探讨了其中蕴含的屈原“美政”理想。李燕^[28]通过对屈原《九歌》《招魂》《大招》的研究,考察了楚人的祭祀习俗,描绘了楚人祭祀时的仪式、祭祀中使用的乐器、巫舞的基本面貌。

《天问》一直是楚辞研究的难点与热点。刘晓梅^[29]以荣格等人的“原型”批评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论述“问天”文化心态与早期人类思维及文学创作的重要联系,探讨了“问天”文化心态的源流演变。廖勇鹰^[30]以《天问》中神话传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剖析了神话传说暗藏的文化意蕴与文化归属。

楚辞意象丰富多样,相关研究内容丰富,创见迭出。屈原作品以“香草”比兴,其中兰草深受屈原喜爱,是他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香草。张晓蕾^[31]认为,屈原作品中的兰草有佩饰、祭祀用品及景物三类作用。兰草是屈原情志的象征和寄托,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文化风貌。自《诗经》始,花草意象就在文学作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意象对《楚辞》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楚辞》中,花草意象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象征比喻系统并得以深入运用。耿英杰^[32]从“以

花草喻人”之手法、花草之“烘托作用”和“寄于花草之情”三个方面分析了《楚辞》对《诗经》花草意象的继承和发展。屈赋爱描写水,水意象出现频繁,内涵丰富。庞美凤^[33]认为,就种类而言,屈赋水意象可分为自然的水意象与神话的水意象两大类。就内涵而言,屈赋水意象既表现了屈原被贬谪流放时的孤独、痛苦的情感,也寄托了诗人的政治诉求。彭咸意象既是屈原的美政理想,也是他的精神归宿,彭咸意象的生成反映了屈原对生命存在的认识。曾凡^[34]认为,这种认识与楚人“太一生水”且“藏于水”的宇宙观念一致。屈原选择以沉江完成生命形式的转换,正是楚人世世代代积淀起来的崇巫、尚巫的思想和人生哲学对其行为的引导。屈赋中神灵形象众多,杨昕^[35]认为,它们可分为天神形象、人鬼形象、人神形象、生物神灵形象四类。其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二是阴阳和谐的思想;三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一直以来,楚辞的文献学研究成绩卓著,本年度学者们也多有高见。文字方面,如《离骚》首八句中说“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灵)均”,张伟权^[36]以为,“灵(灵)均”的“灵(灵)”与“巫”相通,“灵(灵)”等于“巫”。屈原字“灵均”应是具有为民谋福祉意义的文化符号。魏改霞^[37]认为,灵的繁体“靈”,从构型来看,上面是云,下面是巫,即巫师祈雨。巫自古有通灵通神之意,因此衍生出灵字本身的两种含义。从巫字的角度看与神灵有关;从祈雨的角度看,灵字又有下落、降落的意思。楚辞中出现的由巫师扮演的角色,如灵保、神保等,皆取自灵字的第一种意思;而像灵修、灵均、杨灵等楚辞中表示下降、降临意思的词语则是取自灵字的第二种意思。

音韵方面,如谭家斌^[38]认为,从古代汉语至现代汉语的演变过程来看,作为官职“大夫”的 dà fū 音自元初的口语中演变而来,三闾大夫作为古代官职名称,其“大夫”在古代读 dài fū 音,

而在今天则应读 dà fū 音。虽然古代涉医类及行政类官职的“大夫”都读为 dài fū 音,但从古籍记载考察,三闾大夫职掌不涉医官。钱芳^[39]对屈赋中的楚地方言词汇逐一作了考辨,认为楚辞最大的特点应体现在用楚地方音诵读上,而不是方言词汇的运用。“兮”是音乐的泛声,文本中的虚字为楚辞音乐性的标志性符号。戴伟华^[40]认为,标明“楚歌”的作品,有“兮”字是音乐泛声的记音表现,而不带“兮”字的楚歌则是文本记载。传世《大招》在形式上是《招魂》的招辞部分,其中“魂乎归徕”与“魂兮归来”的差异,说明彼此的关系不是文本的模仿,而是对音乐记音的不同。梁文勤、周建忠^[41]认为,单音节起调是屈赋诗行节奏的典型形态,其实质是单音节音步的确立。单音节音步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单双音节词语的搭配、句式的选择、衬音词的使用等。楚辞音义文献不仅是楚辞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声韵、训诂和提供校勘、辑佚等方面的作用。牟歆^[42]认为,现阶段的楚辞音义文献研究在楚辞的用韵、韵例、注音方法、楚音研究和上古音体系的构建五个方面均有所建树,但也存在着局限于个别孤立的现象、缺乏历史的整体观察等诸多不足。

对“离骚”一词的理解,不仅是作品名称的问题,更关乎作品主旨乃至屈原的思想人格。关于“离骚”的释义,在汉代就有不同的看法,如司马迁、班固和王逸等人都根据自己的见解作出了不尽相同的阐释,其观点主导了后世的看法,并一直延续至今。刘晨琤^[43]从原始文献出发,结合词汇考证,认为作“罹”义的“离”与“骚”存在语法搭配的龃龉;联系屈原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屈原思想的特殊性,《离骚》的主题可以确定为“离别”无疑,从而证明王逸“别愁说”值得采信。《楚辞》中的一些语句,涉及上古天文学,古奥难懂,然因韵文句式省略,往往表意模糊,后人释读,一向歧义丛生。如《离骚》的“摄提贞于孟陬”

与《天问》的“圜则九重”,看似已得确解,细思则习见误会实深。马家骏^[44]依据古代史料和传统纪年重新对其作了绎解。

除了以上论文外,本年度还出版了楚辞文献研究方面的两部著作。一本是黄灵庚^[45]编纂的《楚辞文献丛考》。该书对 200 多种楚辞学著作详细评述,对著作的底本来源、注释的因承等均作翔实考证、评述,且别白是非,有真知灼见,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体现了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同时,该书还附上了相关图书的彩色书影,这对楚辞研究者来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一本是吴广平^[46]所著的《屈原赋通释》。该书是一部屈原赋校注汇评本,由题解、原文、注释、韵部、译文、集评六大板块组成。该书在充分吸收融化古今中外学者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存世的全部屈原赋作了简明的题解、精要的校勘、详细的注释、通俗的翻译,并分析了各篇辞赋的用韵情况,精选汇集了历代的评点资料,可谓是一部体例新颖、视野开阔、资料富赡的屈原赋研究著作。

楚辞对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汉代以来,古今作家无不从屈原及楚辞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文学创作营养,这些作家与屈原及楚辞的关系也成为楚辞接受研究的重点。韩高年^[47]认为,《诗》为“五经”之首,而《楚辞》为“集部”之首,这种古籍归类和传承的特殊性,使《诗经》《楚辞》与后世文学形成很强很密的文本上的“互文性”,形成于先秦时期的“诗骚传统”,成为影响历代作家创作和人格的最基本的动力因素,以及批评家衡量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品位的基本标准。

拟骚作品在汉代大量出现。王亚萍^[48]认为,汉代骚体赋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实现了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蒋庆栋^[49]将两汉

文学作品分为诗和赋两类,分别从思想内涵、题材内容以及形式体制、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研究了两汉文学作品对楚辞的接受与发展。

唐宋之后,屈原和楚辞的影响继续扩大。蒋双^[50]认为,《文选》骚类对唐代楚辞学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唐代文人对楚辞的接受大都受到了《文选》骚类的影响。唐代许多大诗人,无论在人格精神还是文学创作方面都受到了屈原的影响。韩乙堂^[51]与王美玲^[52]都探讨了杜甫对屈赋的运用和点化。张思齐^[53]认为,杜甫《佳人》诗中刻画的女性形象,在命运、性格和品德上均与屈赋中的湘夫人有契合处。肖献军^[54]、赵建明^[55]、汤军^[56]则分别论述了柳宗元、张说、张九龄、李群玉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接受。宋代文人,特别是南宋时期的文人,所处环境与屈原极为相似,对屈原的身世命运感同身受。徐艳凤等^[57]以屈原的精神旨归为线索,将文学与士人心态研究结合起来,审视宋代文士们的内心世界,进而梳理宋代文士们的精神面貌。清末词家在继承“风骚”传统的基础上,以词为根本,从词体、词法、词学批评等角度出发,不断重塑着词学的内涵,也发展了“风骚”的精神实质。方夏卉^[58]选择张惠言、陈廷焯、郑文焯、况周颐为代表,梳理出清末词家接受《风》《骚》艺术传统的历史进程,探寻了“风骚”精神在词学观及其批评范式构建中的作用和意义。

比较视野下的楚辞研究也受到关注。范文兴^[59]认为越南大诗人阮攸和屈原在不少方面有相同之处,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均可以在阮攸的创作中听到回声,找到个人心事及社会感慨的相同之处,楚辞的词语、意象、表达方式等对阮攸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三、楚辞学史研究

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的文化符号,我们既要还原历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

后代人对屈原的诠释。自东汉开始,历朝历代对楚辞都不乏传承和研究。

班固曾先后作《离骚赞序》和《离骚序》评价屈原。在这两篇文章中,班固评说屈原前后矛盾。种园等人^[60]认为,这种矛盾源于班固自身文学偏好与儒家评说诗歌标准之间的不可调和。而汉人对屈原的聚讼纷纭,不仅逐渐清晰了楚辞有别于《诗经》的独特价值,也使文学批评的立论视角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并直接催生了汉代文学理论的成熟。王逸的《楚辞章句》“以诗释骚”,“依诗取兴”。柳宏亚^[61]认为,王逸在承袭传统经学思想的同时,体现出了某些文学批评的特征,比如对“知人论世”方法的重视,对《楚辞》的想象、铺陈等艺术手法的肯定;对文学本质、发生、功能等论题的涉及;等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楚辞研究首推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在《辨骚》篇盛赞屈原“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对于刘勰的楚辞批评也是楚辞学史的一个重点。张莉^[62]将刘勰的评骚与汉代评骚做对比,认为刘勰的评骚方法与汉代以经论骚的方法不同,《辨骚》篇的主旨不是“宗经”而是“为文”,“变乎骚”之“变”由“辨骚”得出,其与“通变”的内涵亦有内在关联。边培文^[63]认为,汉儒拘囿于以经解辞,漠视浸染浓郁荆楚文化的屈辞独特的艺术价值。刘勰一方面依照前人“以经证辞”,另一方面又以南朝人的眼光与审美观品评屈辞,挖掘文本所蕴含的美学特质,体现出对屈辞传统经学化阐释的超越与背叛。王杨等人^[64]辨析了《文心雕龙》与《诗品》楚辞观的差异,认为刘勰与钟嵘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在强调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前提下重视诗歌的文采,是《文心雕龙》与《诗品》都特别欣赏《楚辞》的原因之一。同时,刘勰的全部文学主张是以征圣、宗经的思想为基础的,《文心雕龙》论诗更强调诗歌的政治内容以及美刺讽喻的功能,因此视《楚辞》为《诗

经》之外的“奇”,而钟嵘受儒家影响较小,主张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性情,因而,《诗品》更强调《楚辞》及楚辞系诗人的抒发个体之怨情,这是两部作品楚辞观之差异的根源所在。乔晓慧^[65]、李平^[66]、张何斌^[67]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文心雕龙·辨骚》进行了探讨研究。

宋元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楚辞研究大家,如晁补之、洪兴祖、朱熹等。朱熹的楚辞学著作是宋学时代楚辞研究的典范之作,成功地开辟了楚辞研究的宋学方法与模式。谢君^[68]认为,揭示大义、强调研究的现实意义是朱熹做学问的基本方针。在楚辞研究中,朱熹注重作品大义的梳理而不凝滞于细枝末节的训释,能宏观把握、通透理解而较少牵强穿凿。拥有一套系统的理学思想,有着科学的读书方法,是朱熹楚辞研究能突破陈规、取得突出成绩的重要原因。谢翱是元代《楚辞》研究学者的代表。陈静^[69]认为,他不仅在行谊上模仿屈原,诗作上受《楚辞》的影响也很大,更著有《楚辞芳草谱》一书,对《楚辞》进行了专门研究。对谢翱与屈原及《楚辞》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元代楚辞学的了解。

明代是楚辞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前期因受程朱理学影响而发展缓慢;中叶以后,学术思想转趋自由,《楚辞》新刊新注本大量出现,楚辞学日益兴盛,为清代楚辞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李惠姊^[70]对黄文焕《楚辞听直》一书的体例特征、阐释风格、注释特色等方面展开了论述。沈国飞^[71]着重探讨了陆时雍《楚辞疏》受明代诗话影响而形成的独有特色。《楚辞述注》是明末出现的较为重要的《楚辞》学著作,罗剑波等^[72]考证了该书作者来钦之的家世及其与陈洪绶的关系。段亚广^[73]通过对明代《楚辞》注本的序跋研究揭示了明代社会思潮的嬗变。陈炜舜^[74]以明代政治场域为背景,从明代前期、明代后期、明末、清初明遗民四个时期考察了明人楚辞研究的特色。

清代楚辞学研究繁荣昌盛,大家大作辈出。毛庆^[75]辨析了清代经学与楚辞研究之关系,分析了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对楚辞学的影响,以及各学派治学方法对楚辞研究的推动;同时他也指出,固然各派以其学术优长研究楚辞取得很大成绩,然也因门户之见、营垒意识,使其研究领域的拓展、视野的开阔等受到束缚,令人遗憾地出现某些偏颇或缺失。《骚赋论》是清代出现较早的一篇具有较强理论性的赋体专论。王莉^[76]考订了该书的版本,并梳理了论赋体起源及诗骚赋的异同观念。方人杰《楚辞读本》一直被视为国内未有藏本的稀见清代楚辞学著作,现有的所有楚辞书目类文献皆只著录其日本藏本。陈欣^[77]认为,现存方人杰《楚辞读本》的唯一通行版本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世春堂刊《庄骚读本》。方人杰选辑前贤评论八十一条;从选辑时代来看,他较为重视明人的楚辞论说;从选辑内容来看,他更重视评点性的楚辞论述,而不重视楚辞注本。蒋骥的楚辞研究独树一帜,他在《山带阁注楚辞》中创造性地绘制了《楚辞地图》,分“楚辞地名的考证”“屈原两朝迁谪路线的考证”“屈原作品创作时地的考证”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对楚辞地理进行研究。朱闻宇^[78]认为,蒋骥的楚辞地理研究方法,构建出了屈辞的空间世界,把屈原两朝迁谪行踪和屈辞创作时地直观地融合到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在楚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廖栋梁^[79]认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能在崇实斥虚的文学思想外正视屈辞的“虚构”性质与意义,是对屈辞“艺术性”认识的拓深。

此外,本年度有不少硕士学位论文,选取了清代楚辞学著作作为研究对象。如仲斐^[80]对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进行了研究。陈聪灵^[81]认为,郭焯莹《读骚大例》充满学术个性的研究方法可总结为四点:史学视角与索隐考证、音韵诵读与文字训诂、依经解《骚》与“一经六传”之

说、文献校勘与引赋就《骚》，这对当代的楚辞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林冉^[82]将胡文英的《屈骚指掌》置于乾嘉朴学这一大背景中进行了探讨。张小璐^[83]认为，马其昶的《屈赋微》重视校勘，选用多家注释相互印证；书中引用的注家、注本数量众多、类型繁复，可谓博览群籍，搜采宏富。龚安琪^[84]对清后期颜锡名晚年之作《屈骚求志》进行了整理、点校，并对参考文献、出校记原则予以说明，还针对其训诂方面的得失作了考证、研究。

近代以来，刘师培、钱基博、闻一多、郭沫若、钱钟书、刘永济、姜亮夫等学者在楚辞学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既有小学文献功底，擅长考据，又接受西方文化学、人类学等新思想、新方法，有意突破乾嘉藩篱，学贯中西。刘师培是近代楚辞学者中比较突出的一位。吴慧鋈^[85]认为，他的楚辞研究有三个特色：第一，针对“宗经”，提出“宗骚”的观点，打破传统楚辞批评对经学的依附关系，提高了楚辞独立审美价值和历史地位；第二，援引西学中的“文学地理论”，分析了南北文学不同的成因，肯定楚辞是南方之文的代表；第三，植根小学，考订楚辞异文，但在校勘过程中又综合运用多种考证方法，体现了西方人文科学中的实证精神。刘师培的楚辞研究显示出综合融通的趋势，体现了楚辞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转型，在楚辞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钱钟书在《管锥编》中遵循传统四部分类法且集部以“楚辞”居首的体例，将《楚辞洪兴祖补注》作为诠释对象。徐海梅^[86]认为，钱氏采用由“诗心”而“人化”的独特诠释视角，展现出规律性的人文艺术现象以反映人生世相，并在诠释过程中运用传统经典诠释法和“循环”诠释法相结合的方式使文本意义、作者情感、诠释者体验三者牵扯、融会，形成一个互动循环、圆足周匝的体系。《楚辞洪兴祖补注》因重视楚辞文章学、具有“文化再创

造”的眼光以及文化学研究性质而成为20世纪楚辞研究史上不能忽视的成果。此外，朱佩弦^[87]、单晓娜^[88]、王海远^[89]、舒梓剑^[90]、陈文新^[91]、刘渐娥^[92]等分别论述了戴之麟、钱基博、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姜亮夫的楚辞研究成果。

海外楚辞学研究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日本是海外楚辞研究的重镇，楚辞研究专家众多，他们或着力于屈原其人研究，或注重对屈原作品进行结构分析、音韵研究、文化影响研究等，取得了不少成果。何佳宇^[93]在梳理日本汉学界对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概况的基础上，以近现代译介过来的日本屈原学学者的著作和论文为主要论述对象，评述了日本汉学界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儿岛献吉郎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施仲贞^[94]认为，他于楚辞研究不发空论、不纯谈义理，研究视角注重实际，对楚辞的文体属性、篇目数量、文法特色、创作时地、作者意旨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比较、引申和归纳，于细微处抉微发隐，或辨析、或诠释、或考证，据此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开创出一条楚辞研究的新思路。20世纪50-80年代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相对于上半世纪表现出明显的进步。王海远^[95]认为，他们已不满足于沿着中国乾嘉传统前进，而是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有着日本学者自我特色的研究之路。在方法上，他们更重视地下文物的发现，用之以与典籍文献对照，还十分注意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可谓三重论证。在观点上，他们从哲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角度出发，力求阐发个人的见解。还有些日本学者作出了具有整体性的论述，体现出宏观性的眼光与建立体系的雄心。日本楚辞文献的整理是日本楚辞学的重要子课题，而版本考证是整理的必经环节。李佳玉^[96]对《日本楚辞文献版本的调查与研究》一书作了新的补充，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日本楚辞文献版本信息。

韩国文化与楚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渊源。王钰婧^[97]从地理方位、神话传说、图腾崇拜、端午节的祭祀习俗、哲学以及楚文化代表屈原的作品在韩国的传播六个方面展开了详细论述。朝鲜时期,随着对楚辞的尊崇和阅读的深入,文人开始创作拟骚赋。张佳^[98]认为,他们借用骚体句式表达文意;沿袭楚辞的神话、历史和香草意象,强化作品的象征意义;又仿取楚辞结构铺设章节,在摹拟基础上力求新变,形成了具有典型特征的文体形态。朝鲜时期的拟骚赋在主题内容上突出屈骚情韵,结合自我心境抒写怀抱、品评辞意,展现出丰富的情理内涵。马菁^[99]、王源源^[100]分别考察了朝鲜时期文人成海应、张维对楚辞的接受和发展。两位朝鲜文士都对屈原的形象进行了重新诠释,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其对于国家治理的政治见解。2017 年度还出版了由徐毅^[101]等编纂的《韩国古代楚辞资料汇编》,该书收录了朝鲜半岛历代文献中对屈原与楚辞的引用、评论、研究等相关资料,时间始于朝鲜半岛三国时代,迄于朝鲜王朝末期,内容全面、资料丰硕,对东亚地域的屈原、楚辞的受容研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四、宋玉研究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辞赋作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将屈宋并称,所谓“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宋玉研究近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较多关注。汉载录宋玉的文献可分三类:传述宋玉故事、评价宋玉其人其文、记载宋玉创作情况。龙文玲^[102]认为,由于所处时代、生平遭际不同,载录者对宋玉的评价不一样,但受经学繁荣、政教文学观念的影响,他们大多以是否有讽谏功效为标准评价宋玉作品。因此,这些文献虽值得重视,但仍需回到宋玉作品本身,才能对其价值有更客观的认识。湖南临澧是宋玉被贬后生活多年并终老的地方,这里流传着大量有关宋玉的传说。吴广平等^[103]

认为,这些传说糅合了对宋玉的历史记录与民间重塑,其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成为观照民众集体价值与地域精神的重要窗口。

从史料记载来看,宋玉主要生活于楚襄王和楚考烈王时期,他一生的重要活动集中于由楚都北迁至淮河流域的河南淮阳和安徽寿县两地这一阶段,其创作的黄金时期也在楚都北迁之后。金荣权^[104]认为,宋玉的作品在襄王死后,经过宋玉或宋玉的弟子、后学们重新整理并在作品前面加上“序言”,才变成今天的面貌。魏晋南北朝时期传世的《宋玉集》是一部汇集宋玉所有作品的文集,这本集子也是梁人萧统《文选》和唐代无名氏《古文苑》所采宋玉作品的来源。在《宋玉集》流传的过程中因不断地误入其他非宋玉的作品而最终形成今天 17 篇署名宋玉作品的结果。

宋玉的作品在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征引宋玉及其作品凡十三次之多,对宋玉的文学创作水平、所创造的文学新体裁及其超卓的文学创作技巧均给予了极高评价,体现出文学自觉时期的卓越文论家对宋玉作品文学价值的深刻认识。张德恒^[105]指出,对《文心雕龙》征引宋玉其人其作进行细致探索、阐发,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宋玉的文学史意义颇有裨益。拜昆芬^[106]认为,扬雄、班固、司马迁等汉代学者对宋玉多有批评,不仅对其人格予以否定,对其作品也是颇有微词,直至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首次将屈宋并称才扭转了宋玉一直以来在文学界和赋史上的被动地位。

宋玉“情赋”系列对中唐爱情传奇创作曾产生了重要影响。郭自虎^[107]认为,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主题方面对“好色”的解构与重构,结构上的梦游与荐枕之叙事模式,人物描写方面的光彩照人写法,皆显示出唐传奇对宋玉赋或明或暗的演进之迹。宋玉的《九辩》开创了文学悲秋的主题,其影响源远流长。通读柳永

的《乐章集》，不难发现其中频频以宋玉自况。邱苑妮^[108]认为，柳永在创作中不只直接引用或间接化用宋玉作品的句子，同时也在创作中屡屡涉及宋玉的轶事，其羁旅行役词尤其继承了宋玉悲秋的主题。宋元之际陈仁子《文选补遗》始载所谓“宋玉《微咏赋》”以来，古今学界便有“宋玉作《微咏赋》”和“宋玉微作《咏赋》”两种意见之争。何新文等^[109]考察该赋的形式、内容以及宋玉和王微的时代背景、各自经历与思想创作后认为，所谓《微咏赋》当不是宋玉之赋，南朝宋王微的坎坷经历及其博识才华、玄佛兴趣与“尚悲”文学观念，颇与此赋内容及忧悲主旨吻合，故其有作《咏赋》的可能。

宋玉及其作品在海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何晓毅^[110]论述了《登徒子好色赋》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登徒子好色赋》随《文选》东传后，受到日本朝野喜爱。作者宋玉和主人公登徒子频繁见于日本文人墨客甚至僧侣的各种诗文中。文中提及而在我国早就失传的宋玉之《游仙窟》甚至在日本被朝野上下奉为至宝。经过几百年流传和演变，《登徒子好色赋》中的人物甚至进入民间，在江户年间被夸大成“女鬼”等。“好色”早已成为普通日语，登徒子“好色”形象在日本也影响至今。

五、结语

2017年屈原与楚辞研究收获颇丰，成果显著，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一）新视角的研究呈现常态化

随着楚辞研究不断向新、深、细方面发展，一些学者尝试用美术学、计量学、思想史等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来解决传统问题，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美术学方面，如《楚辞》文本语象丰富的视、听、味、嗅觉元素，触发了读者的感官联想，使诗歌呈现出极强的画面感，激发了历代画家的创作热情。历史上对于屈原楚辞作品的传播，除注释、考证等文字方式外，亦有图画传

播方式。评注与图像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李雅馨^[111]以历代《九歌图》为对象，考察了不同时期楚辞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宋万鸣等^[112]从诗与画的互文关系角度阐述了历代“山鬼”的艺术接受过程。张世磊等^[113]从宗庙壁画与诗文创关系的角度分析《天问》文体，认为《天问》首开由画体生发出相关文体的先河，是题画文学的发端，由此角度可认定它为题画体。何继恒^[114]以屈原及其作品图像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图像和屈原及其作品之间的关系。

计量学方面，如许应田等^[115]利用中国知网数据检索平台，搜集了近二十年宋玉研究文献，并对作家、机构、期刊、关键词等信息进行处理，尽可能多地挖掘出潜在语义关系，描绘宋玉研究的动态变化过程，最终提出了近二十年来宋玉研究存在的难题，就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殷光熹^[116]着眼于思想史研究，认为从《远游》的内容看，诗人是在绝望的心情下寻求精神解脱，“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即超越无为清静的境界，与天地元气结伴为邻，让自己的生命回归到宇宙原初。这是诗人结束生命之前的哲学思考，当系作者晚年的作品。关于《楚辞》的《远游》《卜居》《渔父》三篇的作者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既有从文体风格方面入手研究的，也有从音韵、思想等方面展开探讨的，而陈雨东^[117]则从道家思想在楚国传播的角度对这三篇的著作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结合出土文献研究继续受到学术界重视

出土文献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角，近年来出土的文献愈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大招》在楚辞作品中最富争议。依据出土文本和传世先秦文献的“隶变”现象，张树国^[118]发现几乎所有证据都指向汉高祖时代，如“三圭重侯”“三公”“九卿”为汉初制度，“接径千里”“田邑千畝”为天子采邑，“代水”“羊肠”“交趾”反映

汉初疆域南北至,铺陈楚、吴、秦、代等七地饮食乐舞等等。故《大招》应为汉高祖刘邦大殓入殓礼上的招魂辞,《大招》中的历史事件及诗句出典几乎均可在陆贾《楚汉春秋》《新语》中找到根据,而《楚汉春秋》是秦楚之际最早且唯一的原始记录,为《史记》所取材;《大招》对吴楚饮食的细致描写,证明其作者为来自东楚吴地的陆贾。《九章·悲回风》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出土的竹简文献为简帛编连体例的研究和《悲回风》作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材料。张树国^[119]认为,《悲回风》由两大部分组成,从开头至“宁溘死以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共四十八单句为屈原原作;自“孤子吟而抆泪兮”至结尾共六十二单句为汉成帝时扬雄所作《畔牢愁》,在刘歆等人整理《七略·诗赋略》时追录并“附益”在《九章·悲回风》之下。《楚辞》是中国咏物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赵茹^[120]对战国楚竹简《李颂》《兰赋》两篇咏物作品加以探析,将其与《橘颂》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楚辞咏物传统与《诗经》比兴的承继关系,并分析了早期古人的自然观。

敦煌《楚辞音》残卷为多种书籍收入,并被学界广泛征引,且已有《庚辰丛编》与《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两种排印本。王贤明^[121]认为,在排印本及各家征引中,存在句读、识字等错误,不利于对残卷的有效利用,有待改正。与识字错误相比,句读错误较少,仅有“某,今某复同”“同某某反”两例。识字错误的形成原因大致有两种:有因形近而误,如“升”讹“外”;有因涉他字而误,如“慢”因“謠”而讹“漫”。此外,还存在将夹注误读为正文、不识重文符号等错误。

湖北荆门包山楚简的出土,为宋玉研究带来新契机。利用包山楚简的资料,梁大伟等^[122]对宋玉研究史中的一些有误读、误注、误解之嫌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并运用简文实证考辨问题的是非与真伪,认为宋玉并非先秦宋国王

族的后裔,汉武帝祭祀太一不能作为否定宋玉《高唐赋》的佐证,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臣里”不在楚郢都之中,阳城地望在今河南商水,下蔡故都在今安徽寿县,“秦章华大夫”称“秦”是为尊称的姓氏,《招魂》的谋篇布局是据楚人卜筮程序而进行的艺术加工与文学化提升,《对楚王问》“歌于郢中”之“客”不是外来之客而是歌唱专业人士的特称。

与出土的简帛一样,青铜器也为古代文学研究解决了不少矛盾与悬疑。楚人的青铜酒器式样繁多、铸造精美、功能齐全,从实物角度再现了楚国上层社会一幅幅豪奢盛宴;而《楚辞》文献则形象地反映出楚国酒文化酒类丰富、宴饮方式独特等鲜明特色。刘桂华^[123]以《楚辞》文献与楚系青铜酒器为例,论述了楚国酒文化风貌,认为它们共同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同时,也表现出楚人纵情任意、狂放浪漫的酒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 [1]周建忠.屈原世系考[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24.
- [2]谢天鹏.《史记·屈原列传》《新序·屈原章》《离骚赞序》《离骚经章句前序》关系考——兼论屈原使齐次数与被谗原因[J].云梦学刊,2017(4):43-48.
- [3]郑志强.屈原生年、卒年与享年新考[J].中原文化研究,2017(6):78-85.
- [4]王峰.再论屈原的生辰和生地[J].江汉论坛,2017(8):88-92.
- [5]翦永胜.屈原的出生地“孟陬”(今桃源)新考[J].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17(10):137-140.
- [6]方铭.屈原与端午节[J].铜仁学院学报,2017(2):12-15+26.
- [7]朱玉纯.汉魏屈原论争背后的文化逻辑[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04-107+116.
- [8]龚红林,何轩.屈原文化的界定及其特性分析[J].云梦学刊,2017(4):36-42.
- [9]张世磊.耿介坚守:屈原人格特质及其养成[J].孔子研究,2017(2):105-112.
- [10]秦兴友.论屈原人格范式——兼论屈原人格的当代意义

- [J].社会科学动态,2017(9):42-46.
- [11]唐旭东.南阳屈原传说中屈原形象概说[J].南都学坛,2017(4):53-56.
- [12]郑晓丽.对屈原的再认识[J].文学教育(上),2017(1):174-175.
- [13]周秉高.论《离骚》作于楚怀王十六年秋[J].职大学报,2017(1):1-9.
- [14]屈原“放逐”与“流放”考辨[J].许昌学院学报,2017(3):57-60.
- [15]黄超,余香莲.多元孤独体验观照下的“屈骚”[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2):106-108.
- [16]吴汶津.论《离骚》和《九章》中屈原的“重华情结”[J].才智,2017(2):238-239.
- [17]陈明霞,余颖.论先秦乱世与屈骚精神[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82-87.
- [18]涂早玲.屈原的选择:人,而非神——《离骚》中的“重回伊甸园”尝试与“至情追求”[J].北方文学(下旬),2017(1):68.
- [19]李春霞.屈骚之美学管窥[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7(11):107-111.
- [20]陈望衡.《楚辞》与中华美学的浪漫精神[J].人文杂志,2017(8):40-47.
- [21]刘奕,颜翔林.论屈原心理情结和诗歌创作的美学关联[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2):40-49.
- [22]罗海亮.《离骚》中的时空意识及其美学价值[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15-119.
- [23]孙玉茜.诗性自然——游观美学视域下的《楚辞》自然审美意识探微[J].唐都学刊,2017(1):113-118.
- [24]宋小克.《离骚》神游与四罪流放之关系[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8):97-103+132.
- [25]张文锦.《离骚》中“宓妃”真实身份考辨综述[J].名作欣赏,2017(3):44-45.
- [26]从药汀.从《大司命》考《九歌》非祭祀诗[J].社会科学论坛,2017(2):39-47.
- [27]潘庆.从《九歌》中看屈原的美政思想[J].汉字文化,2017(6):83-84.
- [28]李燕.从《九歌》看楚人的祭祀习俗[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5):20-24.
- [29]刘晓梅.“问天”文化心态与《楚辞·天问》[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7.
- [30]廖勇鹰.《天问》神话传说解读[D].银川:北方民族大学,2017.
- [31]屈原作品中兰草意象探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4):22-26.
- [32]耿英杰.《楚辞》对《诗经》花草意象之继承及发展——以《离骚》、《九歌》为例[J].名作欣赏,2017(6):10-12.
- [33]庞美凤.屈原笔下的水意象[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6):21-25.
- [34]曾凡.彭咸意象与屈原生命哲学的建构[J].云梦学刊,2017(2):52-57.
- [35]杨昕.屈赋神灵形象研究[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17.
- [36]张伟权.“灵均”通解[J].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7(5):5-10.
- [37]魏改霞.试论楚辞中“灵”字的意象表达[J].黑河学院学报,2017(2):213-214.
- [38]谭家斌.三闾大夫音义辨[J].职大学报,2017(4):20-23.
- [39]钱芳.屈赋之楚方言词汇考释——兼论楚辞重在方音诵读的特征[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15):67-72.
- [40]戴伟华.楚辞体音乐性特征新探——音乐符号“兮”的确立[J].文艺理论研究,2017(4):78-88.
- [41]梁文勤,周建忠.单音节起调——屈赋韵律的特点及其意义[J].中国韵文学刊,2017(3):6-11.
- [42]牟歆.楚辞音义文献研究述评[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4):107-112.
- [43]刘晨琤.再解“离骚”——兼论屈原思想的独特性[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7(4):78-83.
- [44]马家骏.“摄提贞于孟陬”与“圜则九重”重解[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2.
- [45]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 [46]吴广平.屈原赋通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47]韩高年.论“诗骚传统”[J].文学评论,2017(5):113-120.
- [48]王亚萍.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3-89.
- [49]蒋庆栋.两汉楚辞接受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7.
- [50]蒋双.重文轻术 附依以传——论《文选》骚类与唐代文人对楚辞的接受[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7(6):31-35.
- [51]韩乙堂.杜甫诗歌引用《楚辞》研究[J].名作欣赏,2017(33):52-54.
- [52]王美玲,张茜.杜诗对屈赋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1.
- [53]张思齐.从《佳人》诗看杜甫对屈赋女神形象的拓展[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1-11.
- [54]肖献军.论柳宗元对屈原辞赋的承传与创变[J].湖湘论坛,2017(5):166-170.
- [55]赵建明.张说张九龄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接受[J].中华文化论坛,2017(5):158-165.
- [56]汤军.晚唐李群玉诗歌的骚怨情怀[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46-49.
- [57]徐艳凤,刘伟.宋代屈原接受研究[J].北方文学(下旬),2017(3):29-31.
- [58]方夏卉.“风骚”精神与晚清词学观的演进[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17.
- [59]范文兴.屈原对越南大诗豪阮攸在创作上的影响[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25-32.
- [60]种园,王永.班固评说屈原的矛盾纠结[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7(3):81-86.
- [61]柳亚.论王逸《楚辞章句》经学阐释方式及其超越[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11):67-73.
- [62]张莉.《文心雕龙·辨骚》篇辨疑[D].温州:温州大学,2017.
- [63]边培文.《文心雕龙·辨骚》对屈辞传统经学化阐释的顺从与背叛[J].贵州文史丛刊,2017(3):68-72.
- [64]王杨,高文强.《文心雕龙》与《诗品》楚辞观比较[J].人文论丛,2017(1):78-85.
- [65]乔晓慧.论刘勰对《楚辞》之探析[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57-60.
- [66]李平,黄诚祯.《文心雕龙·辨骚》“博徒”褒贬色彩问题略议[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5-69.
- [67]张何斌.《文心雕龙》的篇目设置与刘勰的赋体观念[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91-100.
- [68]谢君.朱熹楚辞研究的特点及其成因[J].职大学报,2017(1):24-31.
- [69]陈静.谢翱与《楚辞》研究[J].铜仁学院学报,2017(2):16-20.
- [70]李惠姊.黄文焕《楚辞听直》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7.
- [71]沈国飞.论《楚辞疏》的诗话式疏解及其地位[D].长沙:湖南大学,2017.
- [72]罗剑波,昂俞暄.《楚辞述注》作者来钦之家世及其与陈洪绶关系考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6):153-159+207.
- [73]段亚广.明代楚辞注本序跋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7.
- [74]陈炜舜.明代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6):160-174+208.
- [75]毛庆.复兴与创新——试论清代经学对楚辞研究之影响[J].江汉论坛,2017(1):79-83.
- [76]王莉.程廷祚《骚赋论》研究[D].恩施:湖北民族学院,2017.
- [77]陈欣.论方人杰《楚辞读本》的版本与编辑特点[J].编辑学刊,2017(4):106-110.
- [78]朱闻宇.蒋骥楚辞地理研究方法述评[J].铜仁学院学报,2017(2):4-11.
- [79]廖栋梁.作意幻设——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对屈辞“艺术性”的认识[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6):142-152+207.
- [80]仲斐.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17.
- [81]陈聪灵.郭焯莹《读骚大例》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7.
- [82]林冉.胡文英与《屈骚指掌》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7.
- [83]张小璐.马其昶《屈赋微》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7.
- [84]龚安琪.《屈骚求志》整理与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7.
- [85]吴慧鋈.刘师培对传统楚辞研究的继承与突破[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49-54.
- [86]徐海梅.《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的阐释视角、方法、启示[J].兰台世界,2017(5):97-100.
- [87]朱佩弦.戴之麟《楚辞补注疏》评介[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20-24.
- [88]单晓娜,涂耀威.钱基博论屈原与《楚辞》及其他[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1-4.
- [89]王海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楚辞研究之新变——以闻一多《楚辞》为例[J].北方论丛,2017(4):65-69.
- [90]舒梓剑,宋雪松.论郭沫若之屈原研究[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7(8):46-47+49.
- [91]陈文新.论刘永济屈赋考据的人文性与科学性[J].长江学术,2017(2):56-64.
- [92]刘渐娥.论姜亮夫的楚辞研究[D].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7.
- [93]何佳宇.论日本汉学界屈原及其作品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
- [94]施仲贞.论儿岛献吉郎的楚辞研究[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141-149.
- [95]王海远.日本20世纪50—80年代的《楚辞》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17-124.
- [96]李佳玉.《日本楚辞文献版本的调查与研究》补证[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5):93-95.
- [97]王钰婧.韩国文化与楚文化的渊源[D].荆州:长江大学,2017.
- [98]张佳.朝鲜时期拟骚赋的文体形态与情理内涵[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78-83.
- [99]马菁.论朝鲜文人成海应与楚辞的受容关系[J].名作欣赏,2017(26):46-47.
- [100]王源源.论楚辞对朝鲜文士张维文学创作的影响[J].名作欣赏,2017(14):88-89.
- [101]徐毅.韩国古代楚辞资料汇编(上下册)[M].南京:南京

- 大学出版社出版,2017.
- [102]龙文玲.汉代载录宋玉其人其文的文献考察[J].铜仁学院学报,2017(11):11-17.
- [103]吴广平,何桂芬.临澧宋玉传说的文化意蕴管窥[J].云梦学刊,2017(3):33-41.
- [104]金荣权.宋玉主要作品创作时地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13.
- [105]张德恒.《文心雕龙》征引宋玉及其作品阐释[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24-31.
- [106]拜昆芬.刘勰《文心雕龙》有关宋玉赋的批评探微[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7.硕士学位论文
- [107]郭自虎.宋玉赋对唐传奇创作的影响[J].中国诗学研究,2017(1):66-84.
- [108]邱苑妮.论柳永对宋玉《九辩》的继承[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12-114.
- [109]何新文,宋小芹.陆龟蒙“宋家微咏”臆说——兼及“宋玉《微咏赋》”的疑惑[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59-66+161.
- [110]何晓毅.《登徒子好色赋》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2):21-26.
- [111]李雅馨.以图传文——从《九歌图》看楚辞作品的接受与传播[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5-8+27.
- [112]宋万鸣,彭红卫.屈原《九歌·山鬼》诗画互文关系史考论[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9-14.
- [113]张世磊,廖群.先秦著图训政传统与《天问》题画体论证[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22-130.
- [114]何继恒.中国古代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7.
- [115]许应田,陈亮.基于CNKI的宋玉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22-26.
- [116]殷光熹.《远游》是屈原晚年之作[J].职大学报,2017(1):10-11+48.
- [117]陈雨冬.楚辞与道家思想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中叶的传播[D].黄石:湖北师范大学,2017.
- [118]张树国.《楚辞·大招》:汉高祖丧礼中的招魂文本[J].文学评论,2017(2):164-179.
- [119]张树国.扬雄《畔牢愁》与《九章·悲回风》的“附益”问题[J].文学遗产,2017(1):27-38.
- [120]赵茹.出土文本与《楚辞》中的咏物作品探析[D].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7.
- [121]王贤明.敦煌《楚辞音》残卷误读举正[J].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7(2):97-104+245.
- [122]梁大伟,刘刚.包山楚简与宋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诗歌研究,2017(2):29-45.
- [123]刘桂华.论楚国酒文化风貌——以《楚辞》与楚系青铜酒器为例[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7(5):11-14.

[责任编辑 李有梁]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Studies of 2017 Qu Yuan and the Songs of the South

FANG Ming ZHANG 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nfuciu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 2017, we have obt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studies of The Yueyang Tower Qu Yuan and the Songs of the South.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published works and thesis,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research aspects, including studies on works of the Songs of the South, the history of 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d the study of Songyu.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showed two characteristics: new methods and angles are used; unearthed documents are focused.

Key words: Qu Yuan; the Songs of the South; history of the Songs of the South; Songyu